

慶祝北京師範大學一百周年校慶

歷史系論文集

學衡
史論

上編

萬歲
教師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庆祝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历史系论文集

史学论衡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龚书铎

副主任 朱汉国

委 员 史革新 刘北成 朱汉国
杨宁一 郭小凌 顾 诚
赵世瑜 晁福林 龚书铎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朱汉国

副主任 王东平

成 员 刘林海 陈宝良 张 升
张昭军 郭家宏 耿向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8

庆祝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历史系论文集

史学论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56.5 字数:1476千字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80.00元

前 言

历史学系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后，办学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师资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

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柴德赓、白寿彝等先后在我系辛勤耕耘，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目前，历史学系拥有2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点，5个博士点，1个全国重点学科，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享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学系现有9个教研室、3个研究室和1个文物博物馆，在聘教授21人，副教授23人，讲师4人，其中既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赵光贤、龚书铎、刘家和、顾诚、黎虎等，也有一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80年代以来，相继担任系主任的有白寿彝、龚书铎、唐赞功、郑师渠、晁福林、朱汉国教授等。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师大历史学系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初，历史学系对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成果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近20年来，历史学系教师出版学术著作3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0余篇。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历史学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被译成英、法、日、俄、西班牙等多国文字。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发来贺电、贺信，予以高度评价。龚书铎、顾诚等一大批教师的学术论著荣获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或学校科研奖。

本文集选编的只是北师大历史学系教师的一部分论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百年来历史学系的学术发展状况。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历史学系广大教师和北师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前言	(1)
----------	-----

上 编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 (2)
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	杨秀峰 (5)
谈史学遗产	白寿彝 (14)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	楚图南 (27)
农业与中国文化	钱 穆 (33)
《中国史》自序	陈恭禄 (39)
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传说时代的史料	徐旭生 (43)
《商君书解诂定本》自序	朱师辙 (47)
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	侯外庐 (48)
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	齐思和 (76)
汉初“布衣将相”浅论	唐赞功 (92)
《水经注写景文钞》序	范文澜 (106)
宋代百家争鸣初探	方壮猷 (108)
宋辽之关系	王桐龄 (126)
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	陈 述 (131)
爱薛之再探讨	韩儒林 (145)
《明季史料题跋》节选	朱希祖 (153)
明代必里卫考	张鸿翔 (163)
明清两代的内阁制度	高一涵 (173)
章学诚之志例驳议	李泰棻 (178)
《四库全书荟要》的编修	刘乃和 (186)
《桑园读书记》节选	邓之诚 (201)
《清代通史》导言	萧一山 (212)
王西庄与钱竹汀	柴德赓 (221)
《近代二十家评传》自序	王森然 (235)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梁启超 (237)

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陈 垣 (242)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	张星烺 (256)
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	丁则民 (259)
《圣翰斯特》绪论	杨人楩 (267)
柏林会议与西方列强对非洲的瓜分	张文淳 (271)

下 编

我所认识到的辩证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	何兹全 (280)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刘家和 (284)
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	王培华 (298)
司马迁生年考辨	赵光贤 (307)
读《庄子·徐无鬼》札记	晁福林 (314)
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	罗新慧 (322)
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	周晓陆 (330)
汉代的领尚书事述论	刘欣尚 (342)
试论班固及《汉书》中阐发的为国举贤才的用人思想	刘淑英 (351)
客家民居特征探源	
——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聚居、大宅、坞堡关系	黎 虎 (358)
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	陈琳国 (375)
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	曹文柱 (383)
唐代的选人与官阙	宁 欣 (391)
论庆历荫补新制	游 彪 (398)
琉球民族与华夏民族	武尚清 (410)
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	顾 诚 (423)
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	陈宝良 (436)
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	赵世瑜 (447)
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	曹大为 (457)
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	王东平 (466)
姚莹交游述略	龚书铎 (473)
鸦片战争前后的诗	孙燕京 (482)
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兼与杨其民等同志商榷	王开玺 (492)
从粤筹三厂迁鄂看派系之争对洋务企业发展的影响	李志英 (498)
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	房德邻 (503)
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	张昭军 (511)

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	郑师渠 (522)
辛亥革命与近代科学传播	史革新 (533)
武昌军政府内部矛盾演变与湖北辛亥革命的失败	张 皓 (544)
“洪宪科举”和《呜呼私塾》	张守常 (557)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戴震——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	
对戴震义理学的解说视角为核心	李 帆 (565)
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	朱汉国 (573)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耿向东 (58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	
.....	王桢林 (589)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	郭大钧 (599)
略论解放战争战略决战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民主思想	王宗荣 (615)
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限估计考略	鲁振祥 (621)
民国时期的佛学与科学思潮	李少兵 (629)
民国时期的人力夫分析	王印煊 (640)
关于罗马城起源的几个问题	李雅书 (651)
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	郭小凌 (664)
罗马早期国家论	杨共乐 (679)
关于古代印度农村公社长期存在质疑	周启迪 (685)
马丁·路德的转变	孔祥民 (691)
城市与德国农民战争	侯树栋 (702)
加尔文的教会思想及实践	刘林海 (709)
莎士比亚	杨育才 (716)
虚伪，抑或图新——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新论	张建华 (721)
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	刘宗绪 (727)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杨宁一 (739)
大久保利通的改革思想及其实践	韩文娟 (748)
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与华工的历史性贡献	黄安年 (756)
热那亚会议与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卢文璞 (766)
本雅明简论	刘北成 (775)
试论英国旧的殖民体制的特征及其瓦解的原因	郭家宏 (780)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	梅雪芹 (788)
黑海海峡制度的历史变迁	王 新 (796)
日本法西斯化与侵华战争	金相春 (803)

二战结束前美国的远东战略与对华政策	茹 莹 (811)
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	张宏毅 (818)
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帛书《元与子云书》考释	王冠英 (826)
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	杨燕起 (830)
《史通》的求实精神	李秋沅 (838)
《汉纪》史论的政治观点	李书兰 (846)
略论宋代官府对经部书的校勘	汝企和 (854)
《文渊阁书目》考	张 升 (862)
通典食货典校笺序	曾貽芬 (868)
从历史教育说董仲舒	张显传 (873)
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	潘缉熙 (880)
谈谈对当前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中几个热点问题的认识	马卫东 (887)

上 編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 Karl Marx 和 Friedrich Engels 1848 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 “历史之唯物的概念”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 “历史的唯物主义” (“Historical Materialism”)，(3) “历史之经济的解释”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及 (4) “经济的决定论” (“Economic Determinism”)。在 (1)、(2) 两辞，泛称物质，比马克思的说范围较广；因为他的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 (4) 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Seligman 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而本讲范围，亦不限于马氏的经济的历史观，故用之。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按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有影响的活动，是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有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

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 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 Herder 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亦不能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促动力。象 Herder 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 Ferguson 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 Huxley 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 Hegel 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 Hegel 派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 Benjamin Kidd 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 Aristotle，有些公法学者右之。此派主张通全历史可以看出由君主制到贵族制、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一定的运动，在理想上，在制度上，都有个由专制到自由之不断的进步。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并 Aristotle 亦包在内，指出民主制有时亦弄到专制的地步，而且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

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综观以上所举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惟一方法。

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自己境遇的难苦，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采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

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现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叙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娱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叙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著和他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作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

前 言

李先生^①！诸位同学！今天蒙母校邀来作学术讲演，至为欣幸！实在说起来，兄弟决不敢说是讲演，因为兄弟十几年前，也是此地的同学，今天旧地重来，只能说来看望师友和同学，并附带作一点研究学问的报告。记得前几天，冯友兰先生来母校讲演，曾提到近年来研究历史学方法上的进步，说是由信古到疑古，现在又由疑古到释古，这种见地，是不错的。不过依兄弟看来，不独在方法上，就是在“史观”上，也有进步，所以今天愿意提出《历史动力学说的检讨》这个题目，和诸位同学报告一下。不过，这个题目，包括的范围极广，兄弟对于哲学，没有极深刻的研究，这是希望诸位同学加以谅解的。对于本题，打算分五部分来说明，就是：一、为什么研究“历史动力”？二、关于“历史动力”学说的分类；三、神学史观，精神或心理史观，及唯物论史观；四、各派历史动力学说的总批判；五、结论。

一、为什么研究“历史动力”？

关于这一部分，分三段来讨论，即是：（一）历史动力的意义（二）对于历史“一贯性”解释之反对论，和（三）为什么研究“历史动力”。

（一）“历史动力之意义”，就是要解答：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及历史发展的样式和法则是什么？两个问题。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历史的解释”，“社会观”，“史观”，新史学派所说的“史心”，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史的基件”，及何炳松先生^②所说的“一贯性”等等问题。关于“动力”一词的意义的解释，学说分歧，要而言之，可分为“因素说”，“根本说”及“第一义说”三种。因素说就是多元论，主张历史动力是多元的，并行的，相互影响及互为因果，根本说则谓历史动力是一元的绝对的，根本的，例如玄学史观。至于第一义说，则主张以经济为解释历史的第一要义，例如唯物史观。

（二）关于历史一贯性解释之反对论，有一派的学者，以“历史是事实学而不是法则学”，如德国的迈尔 Meyer 曾说：“历史是许多无次序的单个事实的记录”，文德尔班 (Windelband) 说：“历史是说明再不重复的过去的事实”。何炳松先生也主张：“历史的事实是偶然的而又特异的，并无必然因果法则，只是一种前后相生的关系”。又说：“历史仅能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查，而不能求得普遍之理法”。以上都认为历史是事实学不是法则学因

* 这是杨秀峰同志于 1935 年 5 月 17、18 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学术讲演。原刊于《师大月刊》第 26 期（1936 年 4 月出版），其中第 2—5 部分做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唯物论的社会观》于同年出版。

① 李先生，即李飞生，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历史学家。

② 何炳松（1890—1946），历史学家、教育家，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上海光复大学、大夏大学、国民大学等校教授、暨南大学校长、英士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教育杂志》主编等等。

而反对历史有什么一贯性。其次，梁启超何炳松及约翰孙（Johnson）等，又以“历史是心能的产物，心能之动是自由而不可方物的”为论据而反对史的一贯性。像何炳松所谓：“历史是纯主观的学问，非科学”，约翰孙所说：“人类是一种自由的道德的动物”皆其例证。历史即不是科学，人类即是自由的道德的动物，自然而然的没有一定的法则可循了。此外又有主张“精神不同于自然，精神法则不同于自然法则”者。这虽然稍稍承认历史是有法则的，但此种法则仍然与所谓自然法则不同，决无固定标准可以捉摸，这等于说没有“一贯性”。此外，更有以认定历史有“一贯性”仍是历史家主观的成见，不是科学家客观的态度所应有者。

以上是反对“历史一贯性解释”的理论之大概。“历史一贯性”解释的能否成立，这是历史哲学上多年纠缠不清的官司，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讞。不过我个人的认识则以为，历史本身不仅有“一惯性”的法则可循，历史家更有究明这个“一贯性”的必要。

（三）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动力——“一贯性”呢？

第一：一贯性的要求，是我们研究历史一种自然的倾向。由神学而玄学而科学，是历史动向的必然。由现象到本质，由如何到何故，是科学的要求。于说明“什么”之外，必须追问“怎样”说明。第二：梁启超曾说过“不求因果，既不能明白现在，也更不能推测将来，史学之目的消减”。第三：“假设”是科学研究最初步的工作，历史的法则，是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重要工具。当然“假设必须以客观现象的诱致为基础，而不是凭空想象。历史千头万绪，无假设则有无从着手之苦”。第四：“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认识事的价值，寻绎相互联结，施行大量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原因”。第五：实在，每一个人都有其历史观，由史观影响及于人生观。宗教家离不开“上帝和神”。唯心论者离不开“精神支配世界”于是有“英雄论”，“好人政府论”以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等等。都是其本人的“历史观”使然。人们在平素批评一件事，或观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有一个社会观横在心里。至若综合学派反对“史观”，其实，“综合”也就是他们的史观。历史观影响人生观的例子，触目皆是。

二、关于“历史动力”学说的分类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要确定讨论的范围，然后再谈历史动力学说的分类。今天报告的范围，限于近世史上比较有力的学说。其各派学说之史的发展因时间关系来不及说，暂且保留。目前未定的学说，亦作保留。

关于后者，历史动力学说派别的分类，我先提出两个顶有名的学者的分法：一位是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恩海姆（Bernheim）。他分历史动力学说为：二元的神学史观；唯物论的史观；实证论的史观；康德派历史哲学；及人生论哲学等五项。而第二项中又分生物学的唯物论与经济学的唯物论两个细目（见《史学者何》）；另一位便是现代美国新史学家，巴恩斯（Barnes）。他分历史动力学为八大类：（1）伟人史观。（2）经济史唯物史观。（3）地理或环境史观。（4）精神或唯心史观。（5）科学或技术史观。（6）人类学史观。（7）社会学史观。（8）综合或集团心理史观。（见《History,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历史，它的起源和发展》）

上面两个人的分类法，足以代表许多学者的意见，我们统观而分析之，既不免失之重复，又不免失之庞杂。依我个人的意见，一切历史动力学说可以归为三大类，这三类就是：（1）神学史观。（2）精神或心理史观。（3）唯物论史观。

以下分别详细报告。

三、神学史观，精神或心理史观，唯物论史观

（一）神学史观

关于神学史观，不论古今，不分中外，都是存在的。在欧洲封建社会崩溃以前（16世纪以前），几乎全在神学史观支配之下，尤其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笃信此说者，认为人类的命运，全依神的命令。神权的精神，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把任何人任何物都看成是上帝的奴仆。整个的世界分成“天堂”和“地狱”。“善”和“恶”即是上帝与魔鬼统治的两界。基督教看历史之进程是一个悠久无己的善恶相战；历史便是这种人类战争登天入地的说明书。神通过人实现这个战争。社会及历史表面上是人构成的，实际受神意的支配。历史是具有一定“目的”的，因为神意是具有“目的”的，向着神的方面前进，依着神的预言计划进行，向着神，便得救，违反了神便是罪恶，要到黑暗无比的异端裁判所去受刑。所以漂亮的女人，不当上帝的婢女，便是魔鬼的化身，不得善终的。神学史观者便是这样解释社会和历史，这种社会观——也可以说是历史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乃是因当时社会的基础，而必然产生的。第一，因为中世纪封建经济，农业生产的自足经济形成了较为板滞的生活。对于变迁和进化不易了解，所以极易接受神权的社会解释。第二，此种解释，是以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容易被他们拥护而成立。有以上两种原因，无疑的神权史观在中世纪时代要独盛一时了。

这种史观的代表著作，在第四、五世纪之间，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上帝城》（City of God）一书是其一个。他生于纪元354年死于430年。当时正是宗教及政治混乱时期，希望有一个天上的城市，人们在那里过平静生活尽其力之所及孜孜为善。他便描写了这种理想和希望。还有近古的博絮阿（Bossuet），生于1627年，死于1704年，氏为法国主教，著有《世界史讲话》一书，也充分的代表此种思想。像这种例子，举不胜举。直到科学昌明的今天，仍有它的残余势力。如意国首相墨索里尼主张并且承认宗教在教育上的必要。德国的希特勒也把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得神化了，并且极力神化日耳曼民族的远祖。到现在美国还有些大学，不许讲“进化论”，而且不许说人是猴子变来的。这都是神学史观的残余势力在作祟。

在中国，史学发展自然也脱离不了此种阶段，如历史上所载之“天”，“天命”，“神命灾害”，“祭祀尊为大典”，“伟人神化”——如“玄鸟生商”等等，充满了一部廿四史，这是大家所习知的，无须再加解释。中国史学界，可以说直到最近，长期停留在这个时期中。现在仍是神话连篇，为史学进步主要的障碍。

神学史观对于历史的描写：（1）不注意社会变革，而注意统治者的行动，因为他是神权的寄托者。（2）脱离不了英雄史观，以为历史是有数几个英雄伟人所造成的。（3）历史的内容，不过是帝王表，起居注。（4）历史的结构，统统是政治的流水账掺杂些“神”的显现的意味。以上是神学史观的大概说明。其学说到今天之应否存在。想诸同学都知道的，无待说明。

（二）精神或心理史观

关于精神或心理史观的内容，分七项来说明，即（1）十八世纪上半期合理主义者之“理性”。（2）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唯物论者之“人性”。（3）十八世纪末期康德派之“理想主义”。（4）同时——十九世纪初期黑格尔之“绝对精神”。（5）十九世纪前半期之实证的“社会观”——“知识动力”。（6）二十世纪之“新理想主义”。（7）现代的综合史观。

第一, 十八世纪上半期合理主义的社会观, 完全以“理性”为出发点。当十六世纪的时候, 宗教的权威渐衰,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达——哥白尼 (Copernicus), 开普勒 (Kepler) 等建立地动说, 伽利略 (Galileo) 发明摆动法则, 牛顿 (Newton) 之万有引力法则。于是无神论和唯物论随之兴起。合理主义者主张“理性”统治世界, 拥护科学, 反对宗教, 排除了灵魂, 代替以感觉和理性。理性是社会构成的原动力。他们又都相信有一种永久的自然法则连社会法则都包括在内, 为造物主所创造。这个造物主, 据他们的意见并不是神, 而是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去发现的, 惟不能被感觉。很清楚的他们排除了上帝, 而拿出一个造物主的第三体来代替。他们把一切宇宙现象, 最后都归之于造物主的目的。在哲学上称之为自然观的目的论。合理主义的代表者, 我们要举出法国的笛卡尔 (Descartes), 他生于 1596 年, 死于 1650 年, 是一个大哲学家, 在哲学上提倡唯物论, 著有《方法论》, 《哲学基本原理沉思录》及《哲学原理》等书。其次要算荷兰的斯宾诺莎 (Spinoza), 他生于 1632 年, 死于 1677 年, 因喜笛卡尔 (Descartes) 的学说被犹太教会驱逐而逃亡, 著有《伦理学》, 《笛卡尔哲学原理》等书。德国的莱布尼兹 (Leibnitz), 也可属于此派, 他们都是以理性, 知识及教育去解释社会的进展, 他们顺从人性, 改造人性, 并且恢复人生。自然法则对于卢梭 (Rousseau) 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发生极大的影响。卢梭 (Rousseau) 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哲学家, 生于 1712 年, 死于 1778 年。他著有《艺术专科学谈》, 《人类不平等之由来》, 《忏悔录》, 《新亚罗伊兹》等书, 其中尤以《民约论》最有名, 影响后世极大。他主张自然是一个平等的世界。生活简单, 社会组织复杂, 竞争心利益心发现, 罪恶乃生。不平等之到来, 离自然秩序更远, 一切罪恶都由文化经济而生。人应当顺从自然法则, 以走到合乎自然秩序的社会。人类依社会契约而自动建设的人为秩序, 那便是《民约论》根本的出发点。亚当·斯密 (Adam Smith) 是十八世纪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以著《原富》成名。他的自然法则观念, 以为自然法则是天定的。个人的行事, 应依照自然法; 国家行动, 亦应依照自然法, “自由放任, 社会就进步”, 他在这里演绎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重农学派的理论可以说都从自然法则作出发点。十六至十八世纪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亦然。

第二, 说到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唯物论者的人性论。他们的社会观以唯物论出发, 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应受制于自然法。又谓人类生而平等, 不平等便是违反自然。然而他们的社会观又竟以唯心论作终结。人类不好, 由于环境不好, 要改革社会, 先改革环境, 改革环境, 须先改革人心, 唤起舆论靠立法者的觉悟行善。这一套循环论证, 归结到人性, 是他们的特点。此派的代表可以提出霍尔巴赫 (Holbach) 及狄德罗 (Diderot) 二人来。

第三, 十八世纪末期康德派之理想主义, 康德 (Kant) 主张社会现象无因果法则。社会发展受神意的支配, 神通过人之理性而能支配人类的行为及社会。又认为人有两种天赋: 本能及理性。本能是利己的, 理性是利他的社会性的。二者对立而相成, 要使社会进步, 非注重理性不可。因为理性可以接受神意的指导。康德的理性并非能动的, 所以他说历史发展是缓慢的, 有潜伏的精神统御其间。非理性和人类意志所能左右。不过康德之所谓神, 与宗教之所谓神, 其说法不是一样的。康德的学说, 由席勒 (Schiller), 菲希特 (Fichte), 谢林 (Schelling), 黑格尔 (Hegel) 诸人加以推进, 总称为理想主义的历史观。

第四, 十九世纪初的黑格尔 (Hegel) 之绝对精神论, 他首先承认历史的规律性, 以为历史的发展, 依辩证法的规则性而发展。然而他又以为历史与自然一样, 都是“绝对精神”的外观。“绝对精神”是什么呢, 高高在上, 莫可捉摸, 其究竟仍不外是唯心论。又主张历史的进步, 应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 为无意识时代, 如古代东方诸国。第二, 为自由意识开始发

展时代，如希腊罗马。第三，为普遍的精神圆满发展时代，也就是日尔曼人统治时代。我们知道黑格尔（Hegel）是德国人，因为国籍关系，遂把普遍精神的圆满发展这一顶高帽加在当时大日耳曼民族头上了。历史发展到了普鲁士王国时代，在他看来已是登峰造极，辩证发展的绝对精神遂不再前进了。氏祖述康德，著述极多。《历史哲学》一书在哲学上和历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第五，十九世纪前半期之实证的社会观的知识论，认为历史之进展，依一定之法则。但以知识运动解释历史。如法国的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发明“九阶段说”，以不平等始而以平等终，达到人性之完成。圣西门（St. Simon）则主张组织时代与批评时代是交替的。而孔德（Comte）以为社会发展有三阶段法则：由神学时期到玄学时期，再到科学时期。总之，此派认为历史是有法则可寻的赖知识高下以分别进步之迟速及途程之短长。实证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是其特出见解，他们以为文化的发展由于心理的要素，而把握历史诸原因及法则，则不用心理的方法。

第六，说到二十世纪的新理想主义的历史观，这一派的代表者，是德国西南学派，亦称新康德派。这里且举出文德尔班（Windelband）及李凯尔特（Rickert）二人的理论作代表。他们主张建设文化科学，以具体的时间的东西为对象。不承认历史有什么普遍法则，因为它是精神的产物。又以为文化有价值性：人类的知识，活动是具有自觉作用的，且具有目的和理想，是为价值意识，乃形成文化。所以文化有所谓“人格”和“时代精神”。历史是价值科学，应该立于价值的见解，把事实统一起来，发挥历史人格，以时代精神为内容的中心，统一综合此时代的事实，总之，这一派对于历史动力，只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没有提出来新的具体见解。他们所说的与其谓为解释历史，毋宁谓为怎样写历史。

第七，说到现代的综合史观，这一派否认历史上之因果律的解释，以人类进步观念——“史心”，来代替因果法则。否认因果律之足以供给吾人准则，预测将来。并且认为社会中无独立的事实，文化是有机的混合物，真理必须求之于各种现象，并列研究其交光互影，不拘限于一方面，所以历史应该是整个过去之完整图象。构成社会现象的动力是群体心理。群体心理构成社会各种事像，他们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群体心理。何炳松先生即是新史学派之一，否认一贯性，主张内心动机说。美国罗宾逊（Robinson）认为思想支配历史，因而主张教育之理性化，他已经走上知识史观的道路了。

以上对于精神或心理史观，由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合理主义，说到最近的综合史观。现在对于本段，再作一比较扼要的结论。

心理动力论者，拿精神或心理要素来解释历史，所用的词句：无论是理性或人性；知识或思想；精智或精神；人格或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或集团心理。只是用语的不同耳，解释不同耳，在本质上，并没有怎样大的分别。再者他们利用的方法，就科学的观点来看：康德的悟性，最玄妙不可捉摸。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披着神秘的外衣。法国的唯物论者，想把自然科学方法引用到社会现象，可是走到半路又折回去。合理主义者，不能调合物与心的矛盾，不得已引出来了一个第三者造物主才解决了问题。实证派的方法重经验，贵分析，据事实，是科学的；但对于史象的把握，又表示无力而转入于唯心。新理想主义者，高唱“文化科学”，自命为现代科学的产物；但实在仍然是纯粹的精神论。科学方法自无所用之。综合史观，对于群众心理的研究方法，是近于科学的。可是拿他来解释整个历史，则不免唯心。罗宾逊（Robinson）更最近跑上了知识史观的道路。总之，心理或精神史观中，不承认史象因果律者，固然不能建设历史科学；就是承认者，也是陷于不可解的矛盾，无力建设历史科学。精神或